

《解放日报》2005年12月16日刊发记者高慎盈、黄伟、吕林荫对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的独家采访。现摘选部分,以飨读者。

央视“名嘴”崔永元谈 保卫良心

媒体的责任太重了,有良心太重要了。有时候,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,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不好。可能我这个人太苛刻。可以举些例子。你比如说说“难”。“到现在已经有XX多名矿工遇难,还有一些人失踪,正在寻找。今天的新闻就播到这里,欢迎你收看我们的节目,明天再见”,就完了。大家都这么做,你没觉得这里面非常冷漠吗?这么多条生命没了,还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呢,还明天再会呢,甚至还有说,你有什么意见可以发短信给我们。完全就是职业化的流程。在这些方面,我们就毫无意识。

业。它虽然也是养家糊口,但跟一般的职业是不一样的,它负有社会责任,但是现在这种责任感少了。最近我看到有一张报纸,它吸引读者订报时是这么宣传的,订我们的报纸一年180块钱,但是我们报纸的页数多,每天厚厚一沓,算下来一年卖废报纸的钱就是130块,算下来你只花50块钱就可以看我们一年的报纸。天哪,一点儿神圣感都没有!拿报纸当废纸卖,跟卖红薯、卖黄瓜没有任何区别了。

媒体是个特殊行业,主持人又是公众人物,对他们的要求就得更严格。你比如说,我是一个主持人,我有我的私生活爱好,我爱戴大钻

石,5克拉以上的。没问题,有钱你就戴,没人干涉你。不要去张扬,不要到媒体上去炫耀。上了媒体,就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。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职业要求。在国外,这些东西非常规范。我看过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欧普拉·温福瑞的一个声明,非常感动。有新闻说她出席了老虎伍兹庆祝高尔夫比赛成功的上流社会宴会,她看到后,马上发了声明,说这个报道是失实的。她觉得那种豪华的场合,不符合她自己新闻工作者的身份。但我们的主持人,就很少有人注意这个。

有些新闻,我看到都毛骨悚然。一个城市有人要跳楼,大家从早上开始就都跑过去看,有人在那儿卖望远镜。还有个妈妈,我们印象中的妈妈都是心地善良的,有人问她你为什么回家吃饭,她说,我都等了一上午了,我回家吃饭他一跳,我一上午就不就搭了。我看着特别心凉。如果这个社会都这样,有什么意思呢?大家都没有安全感,更不要说温暖了。所以就非得有人呼唤这个社会有良心,保卫良心。

有个日本商人请一位犹太画家上馆子吃饭。坐定之后,画家便取出画板和纸张,在等上菜之际,绘坐在边上谈笑风生的女主人画起速写来。

不一会儿,速写画好了。画家递给日本商人看,果然不错,画得形神毕具。日本商人连声赞叹道:“太棒了,太棒了!”

听到朋友的奉承,犹太画家便侧转身来,面对着他,又在纸上勾画起来,还不时向他伸出左手,竖起大拇指。通常画家在估计各部位比例时,都用这种简易方法。

日本商人一见这副架势,知道这回是在给他画速写了。一本正经摆好了姿势,让他画。日本商人一动不动地坐了约10分钟。

“好了,画完了。”画家说。

听到这话,日本商人才松了一口气,迫不及待地凑过去一看,不禁大吃一惊,画

家画的根本不是日本商人,而是画家自己左手大拇指的速写。

日本商人连羞带恼地说:“我特意摆好姿势,你却作弄人……”犹太画家却笑着对他说:“我听说你做生意很精明,所以才故意考验你一下。你也不问别人画什么,就以为是在画自己,还摆好了姿势。从这一点来看,你同犹太人相比,还差得远了。”到这时,那位日本商人方才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:看见画家第一次画了女主人,第二次又面对自己,就以为一定是在画他了。

日本商人犯了一个犹太人不会犯的毛病:以为有了第一次,便会有第二次。

而实际上,在犹太人的生意经上,明确地写着一条,叫做:“每次都是第一次交易。”

哪怕同再熟的人做生意,犹太人也不会因为上次的成功合作,而放松对这次生意的各项条件、要求的审视。他们习惯于把每一次生意都看作是一次独立的生意。

(摘自《台港文学选刊》)



看门人

在伦敦圣彼得教堂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看门人。一天,新来的牧师发现这个看门人一字不识,于是解雇了他。失

业的店铺不断扩张,最后成了远近闻名的成功企业家。有一天,一位银行家登门拜访该企业家,问他:“你不识字,去工作,你已经做得这么成功;假如你能写会读的话,简直不敢想象你会怎样。”“是呀,”这位企业家回答,“假如我能写会读的话,我现在就是圣彼得教堂的看门人了。”

该企业家,问他:“你不识字,去工作,你已经做得这么成功;假如你能写会读的话,简直不敢想象你会怎样。”“是呀,”这位企业家回答,“假如我能写会读的话,我现在就是圣彼得教堂的看门人了。”

该企业家,问他:“你不识字,去工作,你已经做得这么成功;假如你能写会读的话,简直不敢想象你会怎样。”“是呀,”这位企业家回答,“假如我能写会读的话,我现在就是圣彼得教堂的看门人了。”

被优点打倒

雷恩是二战时纳粹德国赫赫有名的潜艇专家。此人参与了德军最新型潜艇的设计与建造,掌握着新型潜艇的绝密情报。有一次战斗中,雷恩被盟军俘获。但盟军用尽了种种办法,就是无法让他开口说话。后来,盟军了解到,此人有个最大的优点,就是工作中绝不允许别人有半点差错,哪怕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,他都

会与他人争得不可开交,非要分出个是非曲直。盟军针对他的这一特点,设计了一套审讯方案。盟军每天审他,每次都要经过一间教室,里面有个老教授正在给学员讲解有关潜艇的知识,但错误百出。开始一两天,雷恩只在教室的窗口稍微停了停,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。到了第三天,他终于忍不住了,冲进教室与那个“教授”争辩起来,还拿起粉笔,在黑板上又写又画。由此,盟军便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德军潜艇的绝密情报。雷恩与其说是被盟军征服的,不如说是被自己的优点打倒的。

(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)

吃完大蒜,喝一杯牛奶,仁、核桃仁或杏仁等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,或用醋或酒漱口,也能减轻大蒜的味道。

(摘自《江南保健报》)

蜈蚣咬伤,痛辣之甚,难以言表。但若用人中白(中药店有售)适量涂于伤口,则很快可以止痛、止辣、消肿而愈,安然无恙。(摘自《民族医药报》)

蝉蜕(俗称知了皮)9只,研粉,开水或黄酒送服,30日为一疗程。服用此药一疗程后,视力有不同程度提高。(摘自《天津老年时报》)

健康与养生

快乐的密码

清晨,我去买菜,市场上有一个中年男子,笑得让人觉得不买他的菜就欠了他的人情似的。我选了几个番茄。“4元。”他说。我交给他一张一百元大钞。“找不开,小姐。”可我当时确实没有零钱。“这样吧,你先拿去,明天再给我钱,好吗?”我想了一下,说,“还是不买吧,我明天清早去乡下,两三天不回来,怕不方便吧?”

他豁达地一笑:“没事,没事,只要你记得,一个星期也可以。”于是我坦然地把那几个番茄拎回家。三天后,我在众多的摊贩中找到了他,他一见我就笑了:“买

点什么吗?”并不提钱的事,我选了几条黄瓜,连那天的4元算上,给了他7元钱。他照样笑了:“小姐你好讲信用哦。”我说:“是你首先信任我的。”

彼此道了再见,我转身往回走,忽然发现自己心情很好。信任别人,也值得别人信任,这就是快乐的密码。(摘自《天津老年时报》)

《论党》,是刘少奇1945年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。这个报告对党领导中国革命经历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,做了全面的总结和阐述,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重要论著。但是,报告在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同时,做了不恰当的称颂,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毛泽东个人,并把他摆到了党组织之上的不恰当地位。

不仅如此,报告还把毛泽东与党中央并列起来,认为:“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,而向这个领导闹独立性……就必须进行不协调的但是适当的斗争,来克服这些错误倾向。”

这种针对毛泽东个人的颂扬,把毛泽东和党中央并列,甚至把领袖个人置于党组织之上的地位,在中共七大并不限于刘少奇这个报告。任弼时、周恩来、朱德在他们的讲话和演说中,也把毛泽东看成是党和人民的导师、舵手、旗帜。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,1943年3月20日,中央政治局通过《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》,赋予“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”。中共七大的醒目横幅写的是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”。

当然,在1945年那个时候,党、八路军和新四军、抗日根据地虽然有了很大发展,但距离夺取全国的胜利还很遥远,严酷的战争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。因此,七大期间对毛泽东个人的颂扬,毛泽东自己还是比较清醒和谨慎的。他在4月21日召开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:“……我们必须谨慎谦虚,不要骄傲急躁,要戒骄戒躁。”“至于犯过错误,那也不是一两个人,大家都犯过错误,我也有过错误。……决议案(即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——引者注)上把好事情都挂在我的帐上,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。写成代表,那还可以,如果只有我一个人,那就

不成其为党了。”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,在七大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(大约到建国之初),毛泽东基本上是按照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行事的。但到50年代初,情况就有了变化。如:1951年,党内高层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工会工作方针两个问题上出现分歧,毛泽东的个人表态,就一锤定音,行使了“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”。

从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批评1956年反冒进开始,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专断就进一步发展起来。邓小平说过:“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、一九五九年‘反右倾’以来,党

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,一言堂、个人决定重大问题、个人崇拜、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类家长制现象,不断滋长。”到了50年代后期,党内形成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,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权威,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的反对意见就是反党的政治氛围。显然与中共七大在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同时,把毛泽东捧到超越全党之上,并赋予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,这种封建家长制的领导体制有着直接的关联。

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是领袖专政的典型表现。以致连刘少奇也未能逃脱最终被虐待致死的悲惨命运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奇耻大辱。1980年12月,胡耀邦在谈到个人崇拜的严重恶果时说:危害之烈,莫此为甚!

《论党》与刘少奇的晚年悲剧

鉴于“文革”十年浩劫的深刻教训,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“少宣传个人”。1980年2月,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明确规定:“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,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领袖、阶级和群众的关系。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,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。”这些重大原则的规定,是对马克思、恩格斯党建理论的新发展。

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,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,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,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,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但邓小平始终把自己摆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之中,反对过分突出自己的歌功颂德。他在审阅向十四大的政治报告稿时,郑重指出:报告稿中讲我的成绩,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。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,但绝不是

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。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,谁都没有提出过,我也没有提出过,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,见效也快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。这是群众的智慧,集体的智慧。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,加以提倡。报告对我的作用不要讲得太过分,一个人、几个人,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。”这一番话,不仅体现了邓小平个人的高尚品格,更体现了他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人格,为党的领导人摆正个人与党的组织、与党的领导集体的位置,摆脱个人崇拜的庸俗之风做出了榜样。

纪念刘少奇《论党》发表六十周年,我们既要《论党》中吸取党建理论的积极营养,也要记取党的建设历史中的深刻教训。(摘自《炎黄春秋》第12期)